

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指导（周恩来）

在六大上（李立三）

中共六大的历史背景和准备工作（李维汉）

充满危险的路程（李蓉）

五一村里的笑声和泪水（李蓉）

25 读·党史

第25辑



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

李蓉 叶青如 / 编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5 读·党史
第25辑



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

李蓉 叶青如 / 编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李蓉,叶青如编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1

(读·党史)

ISBN 978-7-5098-3986-7

I. ①在… II. ①李… ②叶… III. ①中共六大(1928)—史料
IV. ①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1388 号

启事:本书选用的部分文字、图片,来源于各正式出版物。其中还有部分作品尚未与有关作者、编者取得联系,我们深感不安。恳请有关权利人联系我社,我们将按《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支付稿酬。(联系人:贺冬英 电话:010-82517196)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佳音

复 审:潘 鹏

终 审:汪晓军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45mm×210mm 1/32

字 数:115千字

印 张:5

印 数:1—3100册

版 次: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3986-7

定 价:12.00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目录

CONTENTS

▶ 综 述

- 1 腥风血雨求生存

▶ 回 忆

- 8 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 /唐韵超
15 出席党的六大和传达六大精神 /罗 明
21 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指导 /周恩来
24 在六大上 /李立三
27 亲历中共六大 /黄 平
31 忆中共六大 /张国焘
38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参加中共六大
工作 /秦曼云
40 中共六大的历史背景和准备工作 /李维汉

▶ 珍 闻

- 45 充满危险的路程
52 火柴盒承受的使命
60 远东大铁路
65 莫斯科郊区的银色别墅
72 五一村里的笑声和泪水

目录

CONTENTS

- 78 邓颖超和庄东晓合唱《武家坡》
83 赵毅敏为接应中共六大代表回国做工作

▶ 史 事

- 87 多个国际代表出席中共六大开幕式
95 瞿秋白主持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99 瞿秋白的报告代表们讨论七天
113 30多万共产党员和群众被惨杀
122 关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

▶ 专 论

- 126 中共六大的进步作用与深远影响

▶ 链 接

- 137 中共六大前后的陈独秀

▶ 视 野

- 145 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
156 编辑手记 / 吕佳音

腥风血雨求生存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救国救民，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建立新中国为职志。这当然会被当时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军阀政府视为异端，极力镇压。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在秘密条件下召开的。因当时党员人数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规模都不大。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到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可以公开活动，一些外国共产党代表和国民党人士，也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气氛十分热烈，但中国革命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

产党人大开杀戒。武汉的形势也岌岌可危。

果然，中共五大结束不久，曾被视为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到了极大摧残。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被停职，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制定了对国民党反动派坚决反击的政策。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八七会议，坚决纠正了党内的右倾错误，总结了大革命失败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制定并实行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正确方针。继南昌起义以后，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大大小小的100多次武装起义。“各地起义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武装，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和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但是，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没有改变，形势依然严峻。正如中共六大政治议决案所概括：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到第六次大会之间，中国革命之中，经过极重大的许多事变：北伐底胜利，帝国主义势力底削弱，极广大的劳动群众迅速地革命化，工运农运在半公开的条件之下广大的发展和勃兴，土地革命底开始深入……后来中国革命便遭受几次严重的失败，丧失革命所得的胜利，共产党受着摧残，群众运动受着压迫。

据当时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负责人描述，中共六大召开的形势是：“反动势力猖獗、最重要的革命成果丧失了，群众运动遭到镇压，中国统治阶级的地位大为巩固，由于受到反动势力的一再打击，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大为减少。许多地方党的组织几乎全遭破坏”。相比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活动环境，完全可以用极为恶劣来形容。

首先，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新军阀凶恶地镇压革命、屠杀工农没有停止。特别是各地按照八七会议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精神，先后组织武装起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这一时期中，党的著名活动家和工农领袖被残杀的就有：陈赞贤、杨闇公、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邓培、李大钊、范鸿劼、李启汉、陈延年、赵世炎、王荷波、杨培森、肖石月、王一飞、向钧、李子骥、涂正楚、袁孟冰、周文雍、陈乔年、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田波扬、侯绍裘、张太雷、张佐成等

数十人。据周恩来在六大的组织问题报告中统计，从1927年3月到4月，共产党员、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被杀害了12.0548万—12.0638万人。从1927年5月中旬到11月，共产党员、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被惨杀达16.8万人—17.1万人。从广州暴动到六次大会前又被屠杀了2.658万人—5.23万人。总计1年又3个月当中，被惨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5128万人—32万余人，被投入监狱监禁者达4600余人。仅从1927年4月10日至年底，江苏省就被捕5657人，1836人被杀害，党团员骨干被害850人。

同时，党的地方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大革命时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共地方组织，许多被打散了，不少党员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党的活动失去了大革命时期可以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被迫全部转入秘密状态。当时在赣东北地区开展革命工作的方志敏曾回忆说：“我们不但无扎机关之处，连藏身地也难找到。日间不能走路，要在夜间悄悄的走；大路不能

行，要找偏僻的小路走；房屋不能住，要躲在树林里、岩石下或水沟里的茅蓬里去住。一天要跑几次兵，晚间躲在茅蓬里睡觉，也得留心警戒，稍一不慎，就有被敌人打死或被俘的危险；环境的险恶和困难，是无以复加。”

第三，党的队伍十分混乱。因为形势的严峻，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脱党，有的甚至叛变革命，出卖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全国的党员数量一度由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虽然在八七会议后，党确立了正确的方针，党的工作得到较大的恢复和发展，但党内思想仍然存在着混乱现象，特别是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教训如何认识，对当时革命的形势、性质如何认识，如何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一些重要问题，党内存在不同意见，甚至争论不休，各执一词。一些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不知何去何从；一些人又表现出盲动主义倾向，不顾客观条件一味蛮干。而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又出现了过分强调党的领

导机关成分工人化的倾向，过分追究个人责任的惩办主义倾向。一些不赞成党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的党员，甚至退党、另组政党。总之，党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中国革命在中共五大和中共六大之间，是“一个很严重的危急时期”（瞿秋白语）。

1928年1月下旬，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曾用名亚历山大罗维奇），从上海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信，谈到召开中共的党代会，对于中共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因为“目前面临的问题很复杂，必须对所有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为了充分弄清革命的前景和任务问题，解决目前党内的状况和克服党内一切错误倾向，迫切需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他还强调：只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才具有权威性的地位和作用。关于会议地点，米特凯维奇认为在苏联开会合适的。因为“在这次党代会上很需要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切实领导。

现在正需要帮助党来弄清所有问题，因此我们和中央一起给你们发去电报，我们认为在苏联境内召开代表大会是合适的”。他还说明中共不能在中国境内召开党代会的三条理由：一是由于要冒遭受破坏的危险；二是因为这里没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重要代表；三是因为环境不安宁会带来焦躁情绪，不可能心平气和地、认真地进行工作。所以，“在中国召开代表大会非常困难”。

由上可见，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最初是来自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的建议。同时，中共方面也考虑到，因为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将于1928年春季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也将于同年夏天在莫斯科举行，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参加。因此，中共中央没有再考虑在香港或澳门召开六大，而是于1928年2月13日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执委会，请求批准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并

要求国际执委派代表团参加，斯大林、布哈林能有一人出席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既采纳了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也考虑到中共方面的要求，在苏联境内开会，毕竟有利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也有益于代表们的安全和认真工作。因此，1928年2月22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召开会议，在听取关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问题报告后，作出决定：“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于4月底或5月中在西伯利亚境内召开代表大会”。苏联西伯利亚比较靠近中国，以后确定的开会地址莫斯科更是当时苏联的首都和政治中心，也是共产国际所在地。因此，共产国际同意在苏联境内开会，对于当时处境困难、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之处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显然是值得高兴的。

由于出国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大都为国民党政府通缉的对象，所以六大代表在出国途中都有某种历险的经历，据邓颖超同

志回忆，六大代表分批出发经大连、哈尔滨赴苏。她与周恩来赴苏联的途中乔装古董商人，在大连遭遇水上警察的仔细盘查。警察怀疑周恩来的身份，甚至直接喊出周恩来的姓名。周恩来机警地应付过警察的盘查，但是为了安全起见，甚至销毁了接头的证件。

各路代表经历千辛万苦，历时一个月，于6月中旬到达莫斯科。1928年6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前来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人。斯大林向与会代表谈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以及革命高潮和低潮的辩证关系。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女士在《我的中国缘分》一书中谈到当年斯大林接见中共六大代表的情况。她回忆说，会见是在绝密条件下进行的，最关键时刻斯大林把速记员都打发走了。斯大林和中国同志长时间地讨论了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发展规律。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绝密条件下于1928年6月18日至



中共六大会址：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塞列布若耶别墅

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区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有142人，其中84人有表决权，34人有发言权，代表着全国40000多名党员。联共（布）的代表、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和青年国际的代表作为嘉宾出席了中共六大。会议于6月18日召开，至7月11日结束，历时24天。

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中共六大产生了由23名中央委员和13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

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从八七会议到中共六大，虽然历经大革命失败的严重摧残和盲动主义的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经过艰苦努力，仍然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据中共六大组织问题报告和统计，全国中共组织计有：广东、福建、云南、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顺直、山东、山西、满洲、河南、陕西、四川16个省委，1个南洋临时省委，37个特委，400个县委，36个市委，41个区委，138

个特别支部，全国中共党员共有9万多人。当时的党员成分，工人占10.9%，农民占76.6%，士兵占2.8%，知识分子占7.2%，其他占2.5%。这说明党已经从大革命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力量有所恢复和发展。

总之，中共六大是“在反动势力的残酷打击下，在闻所未闻的白色恐怖笼罩之中，在秘密的地下状态的环境里”召开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下，在党面临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当时的条件下，怎样坚持八七会议制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特别是在三大起义等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革命斗争大多都因敌强我弱而先后失败的困难的情况下，如何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集中全党智慧，进一步认清革命形势，总结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经验教训，制定革命的策略和任务，无疑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

十分急迫而重大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承担而且基本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大会根据党的任务和革命形势，认真地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正确地分析形势，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对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顽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同时，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是按照党章要求，克服重重困难，及时召开的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它所明确提出的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所制定的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统一全党思想，振奋全党精神，明确努力方向，继续为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而奋斗，意义重大。因此，中共六大是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会议，对党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 / 唐韵超

我原名唐宏经，曾用名唐圣修、唐福山、金涛、金红。1901年3月1日出生于辽宁金县董家沟一户农民家庭。16岁时，因家庭生活贫困，经人介绍，到大连日本人开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沙河口工场（今大连机车厂）当了一名学徒工，受尽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和欺压。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大连的爱国知识分子于1920年和1922年先后倡导和组织成立了“大连中华青年会”和“中华增智学校”等进步团体。他们在教授青少年文化的同时，也组织社会青年学习新文化、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我报名参加了青年会



唐韵超

组织的学习和各项活动，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迪，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特别是1922年5月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以

后，全国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各地罢工斗争迭起。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大连工人阶级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些情况。受到强烈震动，认识到要想不当亡国奴，不受日本人的欺压，就要像关内工人那样，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团体。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备，1923年12月2日，我和工厂里的几个进步青年共同发起成立了大连地区第一个工会组织“满铁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并在此基础上，很快发展成为全市性地方工会组织“大连中华工学会”，我被选为大连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并于1926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4月，大连“福纺”纱厂1000余名中国工人为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大罢工，我作为中共大连地委委员、工运部长，并以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参与并领导了这场大连地区有史以来，有领导、有组织、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

的百日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同年10月，我在一次会议上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翌年3月，经党组织多方面营救获释。

1927年7月，大连党组织遭到破坏。为保存革命力量，我同一些幸免于难的党团员逃往奉天（沈阳），继续寻找党组织。1928年初，我在奉天兵工厂做工时，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不久，中共满洲省临委决定由我担任工运部长，领导全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

……我上任后，深入奉天、抚顺、辽阳、沟帮子、西丰等地的工厂、矿山和南满铁路沿线，了解情况，帮助建立工会组织，发动工人同资本家进行小规模的经济斗争。1928年4月，在满洲省临委第二次党代会上，我当选为省委常委，继续从事工运工作。不久，省临委接到中央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中央给满洲省临委五个名额。当时，党内有一种不正确的认识：认为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党内工农出身的干部太少，因此，通知要求最好选工人、

农民作代表，使领导干部中多增加些工农成分。组织部长吴丽实找我商量派谁去合适，我刚到省委工作不久，全东北地区的情况尚不完全熟悉，这样，由吴丽实提名，决定让我、王福全、于治勋、朱秀春、张任光代表满洲省委出席这次会议，并由我负责带队。我们五个人中，除张任光是学生出身外，其余四人都是工人出身。

鉴于当时国内形势的紧张局面，共产国际决定中共六大安排到莫斯科召开。会议之前，全国各地的代表将分批前往莫斯科。当时行走的路线，除一部分由上海乘轮船经海参崴到苏联外，其余大部分由上海经大连到哈尔滨，从满洲里和绥芬河越境。

1928年5月，我们从沈阳乘火车到哈尔滨。临走时，省委交给我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21根火柴，让我下车后到哈尔滨道里区俄国大街一个马车店接头。下车后，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之后我揣着接头的火柴盒找到了马车店。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人已先期到

达这里。张国焘与我打过招呼后，我把火柴盒交给了他。他数了数，对我说：因南方代表语言容易暴露，满洲省委的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你们分到各组，护送南方代表过境。

傍晚，我回到旅馆，把中央的要求向他们四人做了传达，之后他们先期过境，我则留在了哈尔滨。

记得第一次护送的是广东代表团。我到车站买了去满洲里的火车票，带着他们乘上火车。一路上他们见人尽量不说话，一切由我出头。从哈尔滨到满洲里火车要开一天一夜。上车前，接待站发给每个代表一个过境的号码牌，下车后，我们根据手中的号码，找到带号头的马车。马车前面挂着车灯，如果代表手中的号码牌和车灯上的号码对上，就把手中的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不必说话，点点头即可上车了。送走广东代表，我在满洲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返回哈尔滨。就这样，我先后护送云南、贵州和江西的代表过了境。

大约是5月下旬，我护送张国焘、罗章龙、张昆弟等中央代表出发时，张国焘告诉我，这次就不返回去了，一起过境。车到满洲里后，马车夫把我们送到远处山上的一间房子里，晚上我们乘火车到了赤塔，又在赤塔住了一夜，第二天才换上去莫斯科的列车。

记不得是途中的哪一个大站，停车时，我们下车到站台上活动活动。一个苏联铁路工人见我们是中国人，一边用手比划着，嘴里一边发出俄语的卷舌音，我们不懂俄语，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直到火车又开了好长时间，才得知张作霖在沈阳被炸死了。

火车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运行到了莫斯科。一个事先安排好的木架子马车把我们一行拉到了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许多代表，因为有几个省的代表还没有到，会议没有马上召开。有一天，大会秘书长周恩来找到我，对我说：老唐，你怎么把团员也带来了。这时我方知朱秀春竟是个团员。我一时没了主意，问

他：这怎么办。周恩来想了想说，让朱秀春写个入党申请书吧。就这样，经过与会代表一致通过，朱秀春在莫斯科加入了党组织。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期间，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了政治报告（王明翻译），瞿秋白作了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之后，代表们进行了认真的、长时间的讨论。

中共六大是一次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我作为一个入党时间不长，从事省委工作时间很短的工农干部，能够参加党的高级会议，特别是到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心情非常激动。因此，开会的时候总是认真听，认真做笔记。我记得，中央报告中曾指出：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坚决反对强迫工人罢工和盲目实行武装暴动，必须用最大努力恢复工会，用一切力量团结群众，领导群众进行日常的政治经济斗争。听了以后，深感

党中央的报告真是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7月6日，在职工问题讨论中，我简要谈了满洲职工运动的情况。我认为，满洲的职工运动，是全国工人运动很重要的一部分。东三省有许多大工厂、铁路和矿山，产业工人至少有50余万。像这样聚集了广大的产业工人的地区，如果我们党不注意它，把它放弃了，实在可惜。

东三省过去的职工运动之所以没有成绩可言，是因为我们党没有领导广大群众进行经济斗争。虽然小的斗争是有的。过去有行会性质工会的组织，现在连这样的工会也没有了。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以及我们党不太注意满洲的职工运动所造成的。

从前党只注意南方如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工作，以为把南方工作做好了，可以进行北伐。其实这是机会主义的观点。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党注意南方各省的工作，我只是希望大会同样地关注满洲的职工运动。

我还介绍了当时满洲各地职工运动的情况：（一）大连。大连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策源地，有产业工人四万多人。大连过去有过共产党和工会的组织，当上海和广东的工人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在北方党和工会指导下的大连工人也开展了一些活动。现在的情形不同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北方所有的组织——党和工会都被破坏了（过去北方的组织，先有工会，后有党的组织）。这表现在三个时期：在1926年福纺纱厂大罢工时，我们党指导下的工会，援助罢工工人，结果使资本家让步。但是党也受了部分损失，工会许多干部人才被捕。第二时期，经过第一时期工会的打击后，我们党领导工人重新恢复了工会的组织（1927年7月），但是又遭到更大的镇压，工会被封闭，工人被逮捕，党的组织被破坏。第三时期，1928年1月，党的组织重新恢复。但在五一劳动节的活动，工人被捕四五十人，党组织可以说是没有了。不仅大连